

# 青年團與政治動員：上海私營 工廠民主改革的案例分析

• 鄭維偉

**摘要：**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助手與後備軍，服務於中共在特定時期的中心任務。在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改革」運動伊始，青年團的組織狀況與思想狀況均不容樂觀，但在聯繫青工與帶頭示範方面的優勢是其他組織所難以替代的。在民改的準備、全面交代與民主建設階段，青年團都積極參與，成效顯著。訴苦運動在私廠民改過程中處於樞紐地位，而訴苦在中共庇護下成為工人的「特權」。由於城市社會政治生活的複雜性，工人所遭受痛苦的種類及造成痛苦的根源都遠較農村複雜，因此民改中的訴苦也比土改中的訴苦有更多的層次。訴苦不僅是一種動員，而且也為工人全面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鋪平了道路，最終經過民改，中共實現了清理工人階級隊伍的目的，並在他們當中成功地塑造出對新社會和新政權的認同。

**關鍵詞：**私營工廠 民主改革 青年團 訴苦 認同

在1951年末，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開始籌劃在私營企業中開展一場「民主改革」（以下簡稱「民改」），使之成為更宏大的「社會改造」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sup>①</sup>。然而，由於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運動，民改被迫暫停。7月，上海的「五反」運動基本結束，當時民改已被重新提上議程<sup>②</sup>。7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海市委〈關於「五反」運動後在私營工廠進行民主改革補課的指示〉。7月30日，市委成立了「私營工廠民主改革運動辦公室」。短短一個半月的光景，第一批74家私營工廠的民改就基本結束了。到1953年春，3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民改據稱已「勝利完成」<sup>③</sup>；據粗略統計，參加民改的私營工廠有5,000多家，職工有30多萬<sup>④</sup>。

學界對上海私廠的民改已經開展了一些討論。林超超以檔案資料為基礎，詳細地考察了民改運動中的動員技術與新工人階級的塑造，認為這既是社會主

義工業化的需要，也構成新國家對基層社會進行整合的一個方面<sup>⑥</sup>。總體來看，已有文獻側重對這一運動的過程加以敘述，而對運動過程的分析則稍嫌不足。林超超固然對運動中的動員技術進行了分析，但其文將「國家」當作一個籠統的靜態單位，而對構成「國家」的黨、團、工會等不同組織的角色，未有深入發掘。

作為中共的助手和後備力量，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青年團」）服務於黨和人民政府在特定時期的特定任務，通過積極參與、分擔與配合中心任務來展開工作。本文根據檔案資料的梳理，旨在考察青年團參與民改的方式與發揮的作用。文章首先考察「五反」運動後與民改前上海團組織的狀況以及團在民改初期的準備工作，然後考察在民改過程中團組織的運作方式，並重點分析民改中的訴苦運動，最後對民改中為摸清工人內部情況的全面交代階段，以及確立工人階級領導權的民主建設階段，進一步爬梳，以期展現民改運動之全貌。本文將以申新紡織五廠、大隆機器廠和申新紡織九廠機動分部為重點考察案例。申新系統在上海私營工廠中的地位自不待言，而大隆機器廠是上海私營機器製造業中規模最大的工廠，也是市委直接掌控的民改重點。案例的選擇既照顧到工廠規模，又注重工廠內部微觀組織，以期達致管中窺豹的效果。

在中共所列的各類「反動組織」中，有一些其實是民間組織，並非政治組織。中共對此也洞若觀火，但為了解與掌握工廠內部複雜的政治狀況，不得不以運動的方式迫使工人交代。中共對參加反動組織的工人進行了區分，並採取不同的策略。

## 一 私營工廠民改前團組織狀況與民改的準備階段

1952年7月，上海「五反」運動甫一結束，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團市工委」）馬上提出了在私營工廠和商店中發展和建立團組織的半年計劃。當時，團的力量在私營企業中非常薄弱。在25人以上的私廠中，有三分之一尚未建團；25人以下的工廠和商店幾乎全部沒有建團。為此，團市工委提出要在半年內在私營廠、店發展團員到5至6萬人，具體要求是在工廠發展團員佔青年工人人數的20至40%，在商店發展到佔青年店員的20%左右<sup>⑦</sup>。

根據團市工委關於民改運動的一些統計資料，第一批參加民改的74家私廠共有職工35,550人，其中青工11,484人，團員3,396人；團員佔職工數的9.6%，佔青工數的29.6%。從表面上看，團員在青工中的數量還是很可觀的，但由於在發展團組織的過程中出現審查不嚴、盲目發展，甚至拉夫湊數的現象，結果導致團員的政治面貌十分複雜，相當一批團員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一貫道、忠義救國軍等「反動組織」<sup>⑧</sup>。團員在政治上的「不純潔」，無疑削弱了團貫徹執行黨的任務的有效性。

工人參加各種組織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但大多是想尋求庇護，以備不時之需，即使參加過國民黨系統的政治組織，也未必是要在國共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但在革命與反革命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行動模式下，一些社會組織尤其是過去由國民黨主導的社會組織，在中共的政治話語體系中自然就成為了「反動組織」，而工人參與其間至少說明其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

在中共所列的各類「反動組織」中，有一些其實是民間組織，並非政治組織。中共對此也洞若觀火，但為了解與掌握工廠內部複雜的政治狀況，不得不以運動的方式迫使工人交代。秉持打擊少數、團結多數、分化中間派的鬥爭邏輯，中共對參加反動組織的工人進行了區分，並採取不同的策略：第一類為參加一般反動組織的普通成員且無反動行動者；第二類為參加一般反動組織的普通成員而有輕微劣迹者；第三類為反革命組織中的骨幹份子，有罪惡、有民憤，但尚非嚴重惡劣，且解放後已無反革命活動者；第四類為反革命組織中的核心份子，有血債、有民憤的嚴重惡劣份子，或解放後仍與反革命組織保持聯繫並有現行反革命活動者<sup>⑧</sup>。團市工委的統計顯示，在政治面貌不純潔的團員中，比較普遍的是第一類，大約佔82.2%，而第四類則幾乎沒有<sup>⑨</sup>。

即便沒有政治面貌不純潔的問題，絕大多數團員的思想情況也比較混亂。根據團市工委的調查，不少團幹部驕傲自滿，不僅在組織上不聯繫團員，而且對群眾的看法也不正確，竟然認為在抗美援朝捐獻少的人就是經濟觀點重，放工後急着回家不熱心開會的人就是家庭觀念深，小組會上不大發言就是不積極，過去不活動今天積極了就是投機。此外，很多團員有小圈子作風，入團後看不起群眾，不尊重老工人，對老工人的技術不信服，說老工人無啥稀奇，「我到了他年紀比他還強」。團員的工作熱情雖然高，但缺少經驗，作風生硬。不少團員對民改認識不清，要求過高、過激與片面，希望民改一來，一切不順眼的現象全部改好；或摻雜個人情緒和要求，如工資少的想提高工資，被「落後份子」打擊過的要「收收落後份子的骨頭」。在「五反」後，團員「鬥」的情緒普遍高漲，想「再來一次鎮反」，「鬥職員」，「整落後」。進而，不少團員認為資本家參加民改委員會是「界限不清」，強烈要求對資本家要「罰倒痰盂」<sup>⑩</sup>。

綜上分析，私廠民改運動中的團組織是比較薄弱的，團的內部政治情況十分複雜，團員的思想認識較為混亂。本文着重考察的三家工廠的團組織狀況，集中體現了這種情形。

申新五廠共有職工2,139人，其中男工571人，女工1,568人；青工較多，佔34%，有黨員39人。廠內政治情況複雜，1946年，曾有國民黨特務派人來廠組織黃色工會，發展護工隊等國民黨外圍組織。資方代表也曾派洪幫頭目來廠發展洪幫組織，分化並壓制工人團結<sup>⑪</sup>。1949年11月，青年團在該廠建立團支部，團員有96人；1950年成立團總支，人數137人。在民改前，該廠有團員198人，佔全廠職工數的9.3%。然而，團員的組織觀念差，經常有五分之二的團員不過組織生活，甚至有團員想退團<sup>⑫</sup>。該廠民改由區掌握，工作組與原黨支部合併成立新的執委會，由楊浦區委書記王中一、團區工委書記錢其琛、原黨支部書記張妙根分任正副書記，統一領導全廠民改工作。

大隆機器廠是上海私營機器製造業中規模最大的工廠，有職工764人。該廠早在1944年即建立了地下黨支部，民改時有黨員23人。1948年11月，資方曾想把大批工作母機拆分運往台灣，但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該廠工人成功地開展護廠工作，保護機器，並粉碎了國民黨「要壓平上海，先壓平滬西；要壓平滬西，先壓平大隆」的策略<sup>⑬</sup>。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廠內也布置了以工人福利會系統為主

團員的工作熱情雖然高，但缺少經驗，作風生硬。不少團員對民改認識不清，要求過高、過激與片面，希望民改一來，一切不順眼的現象全部改好；或摻雜個人情緒和要求，如工資少的想提高工資，被「落後份子」打擊過的要「收收落後份子的骨頭」。

的許多特務份子，破壞工人運動。1949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團支部，全廠青工229人，其中團員78人，佔職工數的10.2%。起初發展團組織時，有拉夫湊數現象，致使一些反革命份子混入團內，政治情況複雜。支部成立後，情況有所改善，但領導核心調動頻繁，支部書記調了四個，團內沒有經常工作，教育工作很差。雖然團員一般都工齡長、有技術、作風正派、肯積極工作，但團結聯繫青工不力，對成老年工人不夠尊重，脫離群眾<sup>⑭</sup>。「五反」運動中，政府派駐工作隊，發動群眾與資方鬥爭，通過交政策、算細賬、算損害，只經過十天的鬥爭，即迫使資方交代了「五毒」行為，經普陀區人民法院覆查核實後定位為「嚴重違法戶」<sup>⑮</sup>。1952年7月，上海市委派出以丁瑜為首的民改工作組進駐大隆，成立臨時黨委會，領導民改工作。

申新九廠機動分部共有職工239人，其中工人224人，職員15人，二十五歲以下青工58人，佔職工總數的24%；黨員7人；團員23人，佔職工總數的9.6%。工人生產不積極，福利要求卻過高，常與工會鬧獨立，甚至將車間委員會主席轟下台；大部分老工人始終抱着「做生活吃飯，閒事少管」的保守態度；工人內部不團結，時有矛盾，職員與工人的關係嚴重惡劣<sup>⑯</sup>。該廠團內情況複雜，團群關係惡劣透頂。1949年11月建團時，有很多團員是在建國後情緒高昂的文娛活動中糊里糊塗入團的；團幹部不能聯繫實際；加之反革命份子混入支委會，造成支委會分裂，組織幾近癱瘓<sup>⑰</sup>。不少團員在生產上吊兒郎當，不遵守勞動紀律；不團結青工；更不團結老工人，給老工人起綽號，比如「老甲魚」、「老婊子養的」、「豬頭」、「壽棺材」等，更有惡劣者打老工人耳光，用剪刀刺傷老工人大腿，戳對方的臉，指手畫腳，口沫飛濺。有老工人說：「團員不是生產帶頭，學習帶頭，而是吃飯帶頭，講大話帶頭。」<sup>⑱</sup>

儘管民改前團內組織與思想狀況均不容樂觀，但鑒於私營企業中青工力量相對集中、黨組織力量薄弱、政治情況複雜等實際情況，青年團在帶頭示範與聯繫青工等方面，還能有效地彌補黨組織力量薄弱的缺陷，在民改過程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私廠民改的基本過程分三步走，即準備階段、全面交代階段及民主建設階段。青年團積極參與了每一階段。

民改伊始，團市委辦公室發出通知，提出青年團在第一批私廠民改中要注意的問題，要求團在運動過程中要有問題意識，及時總結經驗，以利下一步的工作<sup>⑲</sup>。在準備階段，青年團的主要任務是摸情況、調組織、清理思想及宣傳動員等。要摸清廠內、團內情況，首先必須做好材料準備工作。申新五廠的具體做法是從勞保登記、反動黨團登記、鎮反材料整理入手，並通過勞資協商，徵得資方同意，從工廠人事檔案等各方面搜集材料。同時，還有重點地召開黨員、老工人的小型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以補上述材料之不足。

其次，申新五廠為適應民改任務調整了團組織，組織分支委以上團幹部及工會幹部中團員六十二人參加本廠幹部學習班，作為運動中的骨幹力量<sup>⑳</sup>。大隆機器廠結合工會調整小組，將原有六個團小組改變為十六組，構成工會小組的核心，同時在有三個團員以上的車間建立臨時分支，分支書記由下車間的團支委擔任，參加車間領導核心。

儘管民改前團內組織與思想狀況均不容樂觀，但鑒於私營企業中青工力量相對集中、黨組織力量薄弱、政治情況複雜等實際情況，青年團在帶頭示範與聯繫青工等方面，還能有效地彌補黨組織力量薄弱的缺陷，在民改過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後，大隆機器廠團組織在運動準備階段及時澄清工人和團員的混亂思想，積極宣傳黨的政策。比如，針對青工中存在的混亂思想，即「改革就是改工資，改職員，清洗有政治問題的人」，團組織召開支部大會作報告，澄清民改的任務和目標，保證民改工作的正常進行<sup>②</sup>。

材料搜集、工人排隊與組織調整，以及思想講理，是政治運動開展的前提，而團組織在政治運動中又能進一步收集、鑒別材料，加深對工廠複雜情況的認識，以及清理黨團群組織的不純潔現象，成為下一輪運動的潤滑劑。

## 二 訴苦：新國家庇護下的工人「特權」

私廠民改的第二階段是全面交代階段，又可分為兩步，即訴苦運動與全面交代。訴苦運動在民改過程中處於承前啟後的位置。準備階段所搜集的材料要在訴苦中得到體現或證實，而全面交代與民主建設都要仰賴訴苦運動所營造的氛圍與構建的場景。可以說，民改之成敗取決於訴苦運動之成敗。沒有訴苦階段，無以發動群眾，也難以達成工人階級內部之民主團結，更談不上樹立階級意識與政黨認同。在訴苦運動中，青年團的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人尤其是青工不願意訴苦的思想障礙、帶頭訴苦與培養苦主。

近年來，學術界對於歷次政治運動中訴苦的作用開展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大多著眼於微觀技術，即訴苦的方式和效果，視之為政治教育形式、動員技術、中介機制、心理機制，以及為尋找階級敵人而被導演的政治活動等<sup>③</sup>。這些發現都不無道理，也確實揭示出訴苦運動的重要面向。但筆者認為，上述研究忽視了訴苦運動的基本事實，即誰在訴苦和誰讓訴苦。這種忽略未必是有意為之，而是一種習焉不察、日用不知。如果我們回到這一基本事實，可以發現：訴苦是在中共庇護下下層民眾的專屬權利。

訴苦的主體只能是下層民眾，不論是土改中的農民還是「五反」運動和私廠民改中的工人，而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沒有權利訴苦的。比如在上海的「五反」運動中，若民族資產階級訴說自己的痛苦或難處，是為「叫苦」或「嘆苦」，鮮有人稱之為「訴苦」。在這一上下文中，「訴苦」是對個人生活中的艱難困苦的一種正當宣洩，而「叫苦」或「嘆苦」意味着言說者本身是無病呻吟，較之下層民眾的困難，他們的遭遇稱不上痛苦，相反他們是下層民眾生活痛苦的肇因。因此他們本應無苦可訴，倘若強訴則是不正當的叫喊與哀嘆了。

作為下層民眾的專屬權利或「特權」，訴苦並非出於自然，亦非由下層民眾所爭得，而是借助於外在的、人為的政治力量，即由中共護佑或授予。中共作為工農利益之代表，庇護工農也是勢所必然，但問題是民眾接受這種庇護並非沒有代價，他們必須忠誠於護佑者，聽從護佑者的安排，在護佑者的庇護下生活。明乎此，訴苦作為中共為動員民眾而授予他們的「特權」本身就內涵着政治認同建構的目的。與其說它是一種機制，不如說它是一項專屬的權利。

民改之成敗取決於訴苦運動之成敗。沒有訴苦階段，無以發動群眾，也難以達成工人階級內部之民主團結，更談不上樹立階級意識與政黨認同。在訴苦運動中，青年團的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人尤其是青工不願意訴苦的思想障礙、帶頭訴苦與培養苦主。

從一開始，工人群眾就不是單純地表達個人的苦難，而是要挖掘個人苦難的原因，個人的苦難表達只是導向階級控訴的引子。訴苦的導向性意味着民眾必須在中共預設的軌道上行進，而中共則是運動中的導演或庇護者。

人們在生活中會經歷各種各樣的痛苦，造成痛苦的原因也不盡相同。經歷痛苦是一回事，說出痛苦，尤其是在公開場合傾訴痛苦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訴苦的權利授予工人群眾，是從理論上確立了訴苦的主體；但讓工人群眾將自身遭遇的痛苦宣洩到中共預定的軌道卻離不開政治動員。青年團在私廠民改中首先要克服工人群眾不願意將個人的痛苦公開表達出來的障礙，糾正對造成痛苦之原因的錯誤認識。當時，青工中普遍存在年輕吃苦不多，「無苦可訴，訴也無用，訴苦塌台（訴苦丟面子）」等模糊認識。造成這種認識的原因在於：(1) 不了解訴苦的意義，認為現在生活很好，為啥老是要訴苦；(2) 顧慮訴苦，以防人家曉得他苦出身，講出來被人家看不起，失面子；(3) 對苦不認識，認為做生意吃苦是應該的，不算啥；(4) 怨命苦，認為總是爹娘不好，祖上不積德<sup>⑳</sup>。例如申新五廠團員蔣雅芬的母親被日寇強姦致死，她不怪日本人，反怪自己命硬，剋爹娘；另一團員李秀鳳的母親在國民黨統治時因生活無法維持而投黃浦江自殺，她怕別人笑話，不敢訴苦<sup>㉑</sup>。

另一方面，團員中也存在「我來啟發，叫別人訴苦」的態度。青年人年輕氣盛，為完成黨所分配的光榮任務，在情緒上和做法上難免要「左」一些，「看到群眾不開口，心頭像有塊石頭，擔心完不成任務」。於是，有些團員向群眾「要苦」、「逼苦」、「釣苦」，群眾很是不滿「團員一幅啟發面孔」<sup>㉒</sup>。

團市工委提出，發動團員青工「訴透」過去所受的迫害和隱痛，是提高階級覺悟的決定性一環，為此必須破除青工無苦可訴的錯誤認識。最好的策略是有意識地培養一些青工典型，以苦引苦。如何選擇典型是非常重要的，典型應是：(1) 有普遍性的，如機器廠的學徒和棉紡廠的養成工一般都比較「苦」；(2) 符合政策的，如訴學徒之苦要歸罪於舊社會，以防止引起師徒對立；(3) 有教育意義的，防止講故事、背身世流水賬、缺乏階級分析<sup>㉓</sup>。團組織還召開支部大會進行動員，說明訴苦的意義，控訴工人階級所遭受的痛苦，糾正團員置身於運動之外、以「啟發面孔」行事的錯誤態度，使團員熱情地投入到運動之中接受實際的鍛煉和教育。從一開始，工人群眾就不是單純地表達個人的苦難，而是要挖掘個人苦難的原因，個人的苦難表達只是導向階級控訴的引子。訴苦的導向性意味着民眾必須在中共預設的軌道上行進，而中共則是運動中的導演或庇護者。

一旦團員破除了青工無苦可訴與單純啟發的錯誤認識，他們即積極投入運動，帶頭訴苦、包乾培養苦主及聯繫青工積極份子。據第一批民改46個廠團支部的調查，共有1,366名團員投入運動，其中1,062人積極參加運動，培養苦主483人，協助452人放下歷史包袱<sup>㉔</sup>。為宣傳訴苦的意義，啟發大家的仇恨之心，大隆機器廠鄒阿六團小組的工作計劃提出，團員要在生產時與周圍的工人閒談，分頭到毛坯間、爐灶間、門口幾個涼亭去宣傳。小組會上，團員要帶頭發言，幫助小組長掌握小組討論，不能單純啟發別人，要以組員一份子的身份來發言以推動大家控訴舊社會。團員要分工聯繫群眾，使之在小組會上發言。團員還要一一聯繫青工積極份子，了解情況，分配工作給他們做。團小組每兩天開一次小組會，匯報和研究工作，時間在早晨6時45分到7時半<sup>㉕</sup>。通過這種組織工作，大隆機器廠團員共培養了苦主46人，有效地推動了訴苦運動<sup>㉖</sup>。

美國學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認為，國共雙方在動員民眾方面的差別在於中共通過運用「訴苦」、「控訴」、「批評與自我批評」、「整風」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動員手段，強調每個黨員對情感工作所負的責任<sup>②</sup>。從思想上認識到訴苦的重要性僅僅是第一步，若要使個人訴苦確有成效，以苦引苦，把大多數工人捲入其中，則離不開情感動員。打動人心的訴苦，才能有效力。所以思想動員只是培養苦主的第一環節，更重要的是激發感情，使苦主在訴苦時不是報賬而是流露真情，痛恨舊社會。情感的閘門一旦打開，就帶有一瀉千里的勢能，能感染他人參與，造成爭先恐後訴苦的情狀。很多工人到處訴苦，在車間裏談苦，到工人宿舍裏談苦，甚至吃飯時也談苦。申新五廠「落後團員」施娟娥在運動開始說「我有啥苦，我保證不苦」，但在訴苦到第三天就哭了起來，帶動了整個南廠進行訴苦。申新五廠共有職工2,139人，有1,841人訴了苦，其中訴透的1,240人，訴了主要苦的258人；有298人是因為有病請假只聽了一次或幾次報告，所以沒有訴苦，有苦不訴的只有54人。可見全廠絕大多數人都訴了苦<sup>③</sup>。大隆機器廠有團員表示「過去隨便被人欺侮、打罵，我從來沒有哭過。這次聽了同志們的訴苦，想到自己的苦處，心裏真難過，自己就哭了」。該廠團員78人訴苦234件<sup>④</sup>。申新九廠機動分部共有217人參加運動，214人訴苦，佔98%，211人在訴苦中流了淚，佔97%<sup>⑤</sup>。

不過，情感動員只是激勵工人訴苦的手段之一，而工人訴苦若停留在傾訴個人遭遇的層面，也難以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為訴苦而訴苦，片面強調「訴透」而哭得頭昏眼花，呼天搶地，甚至傷心過度而身患疾病，並沒有提高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時間一長就會導致厭倦。訴苦通透與否，取決於服務於訴苦運動的目的，即發動群眾、明確政策、豐富材料、培養幹部，直接為後面的全面交代階段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為此，團組織要求團員掌握相當的動員技術，明確訴苦的一般規律，對訴苦運動進行引導，即「由明苦到暗苦，由個人苦到階級苦，由生活苦到政治苦，由公開鎮壓苦到分化欺騙以至組織陷害苦」<sup>⑥</sup>。通過回憶舊社會工人遭受的苦難，對比新舊社會、國共兩黨對待工人的不同態度，進而控訴舊社會與國民黨，激發工人對舊社會的痛恨，引導他們熱愛和認同新社會與共產黨，在思想上劃清奴隸與主人、新社會與舊社會、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由此，情感的宣洩與個人傾訴，在中共黨團組織的引導下，轉向對造成個人苦難原因的探究，巧妙地將鬥爭的對象引向舊社會與國民黨，把個人苦難轉化為階級痛苦。而中共是代表受苦受難工人群眾的政黨，工人群眾跟着共產黨與毛主席走，才能徹底肅清苦難的根源，奔向光輝的前景。在這裏，算苦賬與挖苦根是訴苦運動成敗的關鍵。

大隆機器廠團員青工在挖苦根的過程中，表達出顯著的階級認同與政黨認同。以往許多人對反動派的「認識模糊」，現在團員青工對苦根的挖掘卻集中在反動派身上。該廠民改檔案中留下了如下「青工語匯」：「民改以前我把自己的苦都忘記了，更想不到大家的苦。經過了民改，我不但想到了自己的苦，而且認識了這全是反動派一手造成的」；「過去我認為自己是命苦，現在我曉得了不是命苦，是反動派害我們。否則為啥今天我們工人階級做了領導，『命』就不苦

訴苦通透與否，取決於服務於訴苦運動的目的，即發動群眾、明確政策、豐富材料、培養幹部，直接為後面的全面交代階段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為此，團組織要求團員掌握相當的動員技術，明確訴苦的一般規律，對訴苦運動進行引導。

了呢？」；「過去我吃了苦就哭，認為只有我才是這樣的苦，現在我知道大家都是苦的，不是我一個人苦，是階級的苦。」(黑體為筆者所加)◎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只有共產黨才能打倒反動派，才能肅清苦根，讓工人群眾過上好日子。

挖苦根的另一面向即是表達對中共的感激與忠誠，這在大隆機器廠的「青工語匯」中也有記載：「在民改中我看出了工人階級有二種地位，在舊社會中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新社會裏工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們只有跟共產黨走，才有前途」；「國民黨反動派是托〔拖〕人下水，共產黨是治病救人，幫助我們搞好團結」◎。申新五廠青工也說：「國民黨把我們推到糞坑裏去，共產黨把我們從糞坑裏救了出來。」◎

城市的社會狀況、階級狀況都要比農村複雜，工人遭受到的痛苦在種類上也要多於農民，造成痛苦的原因也遠較農村複雜。據第一批民改46家廠3,376名青工訴苦情況的調查，受日本人苦1,283人，受國民黨苦845人，受封建勢力與地主苦389人，受其他的苦37人◎。申新五廠1,841人訴了苦，訴日本鬼子燒、殺、姦、打、狗咬苦的有1,608人，訴逃難、住難民所、挨打挨罵、跑草幫苦的有1,506人，訴國民黨反動派抽壯丁、打罵、侮辱、強姦苦的有1,212人，訴地主剝削壓迫苦的有827人，訴包辦婚姻、地痞、流氓、毆打、侮辱、強姦苦的有281人，訴進廠要過三關、工頭壓迫、送禮苦的有1,674人◎。大隆機器廠團員訴苦234件，其中敵偽時被拉夫、毒打、親人被燒殺者有72件，國民黨統治時期被捕、被打、被拉夫、抽丁的有70件◎。申新九廠機動分部214人共訴出284種苦，其中訴國民黨苦34種，帝國主義苦104種，地主惡霸苦35種，封建剝削苦34種，「二·二」鬥爭苦38種，舊社會制度苦39種◎。

可見，每個人都曾遭受多種痛苦，既反映出社會演變過程中不同統治集團施加的痛苦，也包括日常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痛苦。換句話說，工人群眾遭受的痛苦是比較普遍與深重的，從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小事到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從個人的身體之苦到心靈之苦，都構成了訴苦運動的客觀基礎。每一種苦難都對應着一種或幾種苦根，工人個體對苦難的感知可能是相同的，但對苦根的挖掘卻未必一樣深入。建國前，這些苦難一直作為一種個人事件，甚至羞於對人言，但在訴苦運動中在中共黨團組織的庇護與激發下，個人的痛苦得以公開表達，成為公共事件。在中共的庇護和鼓勵下，民眾可以公開表達自己的痛苦，這成為個人進步與否的標尺。於是，在新國家下做工的新工人，必須傾訴自己在舊社會遭受的痛苦，挖掘苦根，痛恨舊社會，認同新社會。

在控訴大會上，典型苦主哀痛的控訴聲和憤怒的聲討聲，與聽者痛苦的哭泣聲融為一體，構築出特有的公共空間。訴苦運動大大激發與鞏固了工人群眾公開說話的勇氣和參加公共生活的決心。會場好比連結工人與國家之間的紐帶，在其中，工人走出個人狹小的私人生活領域，進入公共空間，而國家則以開會的方式表達意志，引導工人。工人是否願意開會，在會上是否願意說話，就成為衡量工人主人翁地位的重要尺度。申新九廠機動分部過去群眾碰到開會

在訴苦運動中，個人的痛苦得以公開表達，成為公共事件。在中共的庇護和鼓勵下，民眾可以公開表達自己的痛苦，這成為個人進步與否的標尺。於是，在新國家下做工的新工人，必須傾訴自己在舊社會遭受的痛苦，挖掘苦根，痛恨舊社會，認同新社會。



就頭痛，能溜就溜。「五反」前開群眾大會只有半數工人到場，「五反」運動中較好，85%能出席；但運動過後又恢復了原狀。在民改運動以後，情況有了顯著改變：群眾對開會熱愛了，敢於在大會發言了。例如，金炳良白天結婚，晚上堅持開會，自動放棄五天婚假；仇維信訴苦時由於傷心過度，病倒在牀，但仍堅持開會；高慶生有一次因為家中有事非回不可，不得不請假回家，缺席會議，但心懷內疚，好像損失了甚麼似的；耿榮法說：「現在開會像吃鴉片一樣上了癮，逢到有一天沒開會，倒反而覺得很厭氣，沒事做」；泥水匠老師傅朱新榮過去三年來在小組會上從未發言，現在在運動中帶頭訴苦，在小組會上每次都積極發言；老工人陶家德過去開會也只是帶耳朵不帶嘴巴，現在在小組會上發言也很積極，並叮囑記錄同志把他說的話全記下來<sup>④</sup>。

### 三 全面交代階段與民主建設

訴苦運動後緊接着進行的是群眾的自覺交代運動。團市工委對第一批民改的72家企業中的3,124名團員進行了統計，共有737人逐步交代個人主要問題，佔團員總數的23.6%；其中入團時主動交代者佔交代人數的16.8%，民改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交代者佔29.6%，民改中交代者以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交代不徹底而在民改中補充交代者佔52%<sup>⑤</sup>。其實，1949年後上海歷次政治運動中，所有人都要交代個人歷史與政治情況，惟其如此，黨和政府才能逐漸搞清楚城市的複雜情況，團組織也能了解清楚團員個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歷史背景。

大隆機器廠黨委會要求在交代運動中所有人都要「忠誠老實、自覺交代、相互了解、加強團結」，劃清革命與反革命界限，純潔工人階級隊伍。但不少團員青工對交代的認識模糊：問題比較小的認為無所謂，要交代就交代好了，但怕處分，怕組織不信任；沒有政治問題者認為交代與自己關係不大，思想麻痹；問題大的即使理解黨的團結、教育與改造政策，但缺乏信心。對此，青年團首先在內部整理材料，調整團小組，進行國共兩黨對待青年不同態度和「一切忠於組織」的教育，提高團員對反動派的仇恨和認識。其次是樹立典型，以迅速解除團員的後顧之憂，這其實是中共動員全民交代的一大法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屢試不爽。團組織對曾參加過反動組織的人反覆說明黨處理政治歷史問題的政策，着重指出團員對組織要忠誠老實。在典型的模範帶動下，有問題的23名團員（佔全體團員的29%）帶頭交代，並幫助54個工人放下包袱<sup>⑥</sup>。

申新五廠的全面交代運動更為徹底，成效顯著。運動伊始，團員青工的顧慮與大隆機器廠差不多，團總支召開大會打通思想，講明政策，但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團員帶頭交代。與此同時，根據對象不同，團員採取分工包乾的方式，耐心啟發對象交代問題。例如，團員徐和珍幫助曾參加一貫道的老工人張根娣放下包袱，經過兩次談話，張即全面交代。潘啟三知道唐金山「問題大」，比較難搞，就動員唐的外甥陳三寶進行幫助，結果唐交代了問題。在小組交代時，團員按照先易後難、先外圍後核心的原則，一面交代，一面批判，一面解

不少團員青工對交代的認識模糊：問題比較小的認為無所謂，要交代就交代好了，但怕處分，怕組織不信任；沒有政治問題者認為交代與自己關係不大，思想麻痹；問題大的即使理解黨的團結、教育與改造政策，但缺乏信心。

在參與反革命組織的類型之間做出區別處理，能使中共對工廠內複雜的政治情況之了解由表及裏，由淺入深。此外，對參加反革命組織人員的寬大政策更使他們感激涕零。

放，一面鞏固，個人自覺與群眾批揭相互發揮作用。同時，對於前文提到的參加反動組織的四類份子，團員採取了大批解放第一、二類，孤立動搖第三、四類的策略。比如，三類份子沈昌泉雖然參加過六種反動組織，建國後又有造謠活動，並企圖逃往舟山、台灣，但鑒於他在群眾中早已完全暴露，不可能是隱蔽組織的重要成員，但可能對隱蔽組織有所了解，於是在他於大會作典型交代後，團組織宣布他獲得「解放」，結果使一批建國後參加反動組織並企圖潛逃舟山、台灣的份子冒出來<sup>④</sup>。

典型示範很容易產生擴散效應，看到典型免受處罰，不少人為洗清自己也釋放曾參加反動組織的人員之壓力，於是爭相坦白，只是這種坦白的真實性卻是大可懷疑的。據統計，在這一階段申新五廠先後有409人自動報名交代問題，除去120人不屬交代範圍外，正式交代者289人，佔全廠職工數的13.5%，其中第一類242人，第二類33人，第三類13人，第四類1人。第三、四類中有5人被趕出車間離職集訓，於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清理，「搞透」的要求達到了<sup>⑤</sup>。申新九廠機動分部58人進行交代，佔參加運動的工人總數的27%，共交出反動黨團7人，中統1人，工人福利會1人，偽工會2人，護工隊1人，雜軍(包括偽軍、游擊隊、和平軍等)27人，一貫道、天仙道等反動會道門11人，偽警察3人，偽政府任職者2人<sup>⑥</sup>。

團市工委在處理政治歷史問題的政策把握上還是比較謹慎的，既要防止偏激過左，又要防止一團和氣。1952年11月，團市工委根據青年團華東工委〈關於處理混入團內的反革命份子及團內曾參加過反動組織者的指示〉的原則，結合上海市私廠民改補課運動的實際情況決定了前述參加反動組織的四類份子的處理辦法：即第一類一概不予團紀處分；第二類一般免於團紀處分；第三類一般應分別情況給予團紀處分，直至開除團籍；第四類應一律清洗出團。至於被人民政府判罪(包括宣布管教)或剝奪政治權利者，則立即清洗出團。對於團內政治成份可疑份子，未經審查清楚作出結論前，不得處理；對於參加集訓者，俟集訓完畢做出結論後分別情況，按前述原則處理<sup>⑦</sup>。

此外，為團結多數，避免擴大打擊面，各廠團組織必須根據各廠具體情況，對四類份子的比例作嚴格控制。大體上，第一類約佔70%以上，第二類約佔10至20%左右，第三、四類合計約佔10%以下。其中需要懲辦和處理的人不得超過職工人數的千分之二，需要法辦的人數不得超過職工人數的萬分之五，需判五年徒刑以上者才加以逮捕<sup>⑧</sup>。據74家試點私廠統計，在全面交代階段中，有7,096人交代了各類歷史政治問題，第一類佔94.3%，僅3人遭到逮捕(另有150餘人尚在審查中)<sup>⑨</sup>。另據團市工委對64個廠2,574名團員調查結果顯示，參加反動組織的共計563人，佔全體團員的21.9%，其中第一類共468人，第二類76人，第三類19人<sup>⑩</sup>。參加反動組織的第一類和第二類佔總數的95%強，由此可見參加反動組織的人數太多，若都歸之於反革命陣營，一則打擊面過大，二來難以吸引推動運動深入的積極份子。

在參與反革命組織的類型之間做出區別處理，能使中共對工廠內複雜的政治情況之了解由表及裏，由淺入深。此外，對參加反革命組織人員的寬大政策

更使他們感激涕零，如一位團員說：「只怪自己過去腳跟未站穩，弄了一身臭屎，今後要好好做人才對得起大家。」<sup>⑤</sup>大隆機器廠相關青工也表示，「從前共產黨給國民黨抓去就槍斃，現在有歷史包袱的人，共產黨還要幫他們放包袱」，「經過放包袱以後，使我更加明確了共產黨是真正為我們工人階級謀福利，要我們過好的生活，要我們進步」，「共產黨用了偉大的政策，幫助我放包袱。以後我要用實際行動來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sup>⑥</sup>。

私廠民政的第三階段是民主建設階段。這一階段的重要任務是整頓、鞏固與發展基層組織，關鍵環節有二：即（1）在工廠內部微觀管理上廢除「拿摩溫」（“number one”的諧音，指紗廠工頭）制度，建立生產小組長；（2）以建黨為中心，建立健全基層組織，尤其是要加強建團工作。在這兩個環節中，青年團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工廠黨員比較稀缺的條件下，經過運動考驗的青年團員以及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成為充實基層組織的當然人選，在黨的領導下承擔了充實組織的重任。

私廠民政之目的是為了搞好生產，必須堅持生產、民政兩不誤。為此，團組織向群眾進行「生產為誰」的教育，提出私營廠方雖是資產階級，但同樣是為國家生產，生產是工廠的中心工作。例如，申新五廠在運動開始時10支紗錠扯10個小時0.99磅，運動中間上升到1.02磅，運動進入第三階段又上升到1.04磅，創全廠新紀錄<sup>⑦</sup>。廢除拿摩溫制度，建立生產小組長是企業內部搞好生產的微觀制度基礎。1951年9月6日，團市工委辦公室根據青年團紡織第一廠廢除拿摩溫制度產生生產小組長工作中的情況發函指導。在鬥拿摩溫過程中，部分團員有過左情緒，比如「讓他先倒兩個禮拜痰盂，看看他是否真正肯改」，「過去我被拿摩溫打過，你讓我打他」等。針對這種情況，團組織提出要把拿摩溫制度與拿摩溫個人區分開，雖然拿摩溫有缺點，但他們有技術，只要肯改正錯誤，還應主動幫助與團結之。簡言之，拿摩溫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sup>⑧</sup>。私廠第一批民政34家廠1,418個團員中，有113人當選小組長，217人被選為工會幹部，688人擔任黨的宣傳員<sup>⑨</sup>。大隆機器廠改選15個新工廠委員中有8個團員，全廠55個工會小組長中有25個團員，充分說明團員已獲群眾擁護<sup>⑩</sup>。

在加強基層黨團組織建設中，青年團處於樞紐地位，一方面，團組織積極向黨組織推薦優秀團員為發展新黨員的對象；另一方面，團組織積極吸收青工積極份子入團。黨組織要結合建黨工作，在全體團員中進行共產主義、共產黨的教育，這是鞏固與提高團員階級覺悟的重要步驟，也是最有效的擁黨教育。

申新五廠的黨課教育頗為成功。上過第一課「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之後，有人說建國之初「怕共產黨共妻」等逃到鄉下去；上過第二課「共產黨的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之後，團員主動暴露自己不正確的人生觀，例如「過去我只想嫁一個有錢丈夫，可不要做工了」，「我曾經因怨命，還想過做尼姑」，有許多人想過自殺，還有的想「不出嫁，將來做老姑娘」，「過去拿工錢，總想拿錢到鄉下買些田，將來防老」；上過第三課「共產黨員的條件」之後，加強了團員的革命決心，有人想入黨，並改正自己的缺點<sup>⑪</sup>。

大隆機器廠團組織對發展對象進行團的基本知識教育，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舉辦青工講座，介紹團的性質、任務等，共有90多個青工參加，另一方面召開

在加強基層黨團組織建設中，青年團處於樞紐地位，一方面，團組織積極向黨組織推薦優秀團員為發展新黨員的對象；另一方面，團組織積極吸收青工積極份子入團。黨組織要在全體團員中進行共產主義、共產黨的教育，這是鞏固與提高團員階級覺悟的重要步驟。

座談會，徵求青、老年工人對申請入團者的意見<sup>⑨</sup>，由此提高了青工對團的認識，端正了入團動機。青工王介民說：「以前我要入團只是為了進步，現在才知道主要是為人民服務。」有的團員說：「以前認為不入團同樣吃飯做生活，有啥關係。現在知道只有依靠組織，才會有更好的進步和成績」，「老早看見個別團員不好，就認為青年團和我們無啥區別。現在曉得團是光榮的，是有全人類解放的遠大目標」；有的自我剖析：「早前打了報告，沒有批准，就認為團不了解我。現在知道是自己有缺點，否則因為啥不吸收我呢？」<sup>⑩</sup>

經過黨團教育，據第一批民改34家私廠調查，2,298個青工中，積極份子從500人增加到970人，近乎一倍，已發展入團共409人，尚有發展對象534人<sup>⑪</sup>。申新五廠有125個青工要求入團<sup>⑫</sup>，129人要求入黨，其中第一批經過正式申請，並由黨支部審查的39人中有29人通過<sup>⑬</sup>。大隆機器廠吸收30個青工入團，湧現出43個青工積極份子<sup>⑭</sup>。申新九廠機動分部60人提出入黨，26個青工要求入團，在運動中湧現出大批積極份子74人，較運動前增加42人，佔全車間人數的31%，這是前所未有的<sup>⑮</sup>。

經過黨團教育，有效地克服了職工之間有礙於生產的不團結現象。此前，群眾認為「別樣都能搞好，團結無法搞好」、「到棺材裏去才會團結」。但經過教育和團員幫助後，職工間不團結現象減少了。申新五廠青工周桂芳與周杏妹三年不講話，經團員楊雲娣、翁琳霞耐心幫助，結果團結起來了<sup>⑯</sup>。大隆機器廠青工言：「國民黨用各種花樣來破壞我們工人的團結，現在毛主席要我們團結，完全是為了我們工人的福利。」<sup>⑰</sup>申新九廠機動分部青工王志銘和團員周志偉在「二·六轟炸」時因一言不合，三年來王視周若敵人，經教育後，在團結大會上他們緊緊握手<sup>⑱</sup>。

原來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其話語權是相當有限的，但在革命轉型中尤其是在中共的庇護下逐步取得了話語權，其中訴苦幾乎成為其專屬權利。這種權利一旦授予，即具有相當的慣性，很容易演變為愈是下層則訴苦愈正當的現象。

## 四 小結

上海「五反」運動剛剛結束，中共即推動私營工廠和企業進行民改運動。從觀念上看，這一運動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的實際領導地位，明確誰（工人階級）領導誰（資產階級）、誰依靠誰、誰養活誰，把「階級」和「剝削」的觀念更深入地灌輸給工人群眾。從制度建設上看，這一運動是為了廢除私營企業中不合理的生產管理制度，特別是拿摩溫制度，建立生產小組長制度，這樣既能與國營企業的民改相匹配，也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微觀制度基礎。從組織建設上看，這一運動是為了純潔黨、團、工會組織，剔除國民黨和封建會道門份子，確保領導權掌握在中共及其外圍組織手裏。

在民改之前，私人工廠和企業中的黨團力量，無論是從組織狀況還是從思想狀況上來看，都很薄弱，個別企業甚至沒有黨組織。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力量，有效地彌補了黨組織力量薄弱的缺陷。雖然團組織狀況與團員思想狀況存在諸多缺陷，但在典型示範與聯繫青工方面，青年團有着其他組織無法取代的優勢，成為黨組織在民改中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同時，

青年團員也在政治運動中接受考驗，提高團員階級覺悟，純潔團組織，雖然還有各樣各樣的問題，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比較圓滿地完成了民改的任務。只要團員骨幹能在中共領導下組織起來，就能有效地彌補其數量不足與組織不純潔的缺陷，展現出相當的行動力。

訴苦運動在私廠民改過程中居於樞紐地位。本文提出訴苦是中共庇護下的工人「特權」。其一，訴苦的主體是工人，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訴苦的權利。原來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其話語權是相當有限的，但在革命轉型中尤其是在中共的庇護下逐步取得了話語權，其中訴苦幾乎成為其專屬權利。這種權利一旦授予，即具有相當的慣性，很容易演變為愈是下層則訴苦愈正當的現象。其二，生活中人們會經歷各種各樣的痛苦，但大多是個人事件，最多在親朋好友間進行傾訴或投書媒體，尋求安慰，鮮有在公共場所表示自己遭受痛苦，而對於苦根也多追溯為命運的捉弄。但在政治運動中，中共作為工人階級政黨，鼓勵工人公開表達自己的痛苦，並將痛苦的原因追溯到國民黨與舊社會。在挖苦根、算苦賬的過程中，中共巧妙地將之導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其他落後勢力的盤剝，訴苦成為建立新的政黨與社會認同的不二法門。土改中的農民訴苦雖能為私廠民改工人訴苦提供經驗借鑒，但無論是城市的社會政治情況、工人遭受痛苦的種類還是苦根，都遠較農村複雜。比如在受苦分類上，土改中分類是比較籠統的，但在民改中分類是比較精細的。工人遭受的每一類痛苦都對應一種或幾種苦根，這遠非農民訴苦的挖苦根所能比擬。

在政治運動中，中共作為工人階級政黨，鼓勵工人公開表達自己的痛苦，並將痛苦的原因追溯到國民黨與舊社會。在挖苦根、算苦賬的過程中，中共巧妙地將之導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其他落後勢力的盤剝，訴苦成為建立新的政黨與社會認同的不二法門。

## 註釋

- ① 張金平、張長森：〈私營企業的民主改革〉，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294-301。
- ② 據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記錄，在1952年6月24日團市工委即專門開會討論私營工廠民主改革工作。〈團市工委1952年大事記〉，上海市檔案館，C21-1-166。
- ③ 鄒榮庚：〈建國初期上海的企業民主改革運動〉，載鄒榮庚主編：《歷史巨變：1949-1956》，第一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214-36。
- ④ 陳祖恩、葉斌、李天綱：《上海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80。
- ⑤ 林超超：〈新國家與舊工人：1952年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改革運動〉，《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頁67-86。
- ⑥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關於「五反」鬥爭以後半年內在私營工廠、商店中發展和建立團組織的計劃〉，上海市檔案館，C21-1-156-37。
- ⑦⑧⑨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關於民主改革運動的一些統計資料〉，上海市檔案館，C21-1-160-44。
- ⑩⑪⑫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關於在私營工廠民主改革補課運動中處理混入團內反革命份子及團內曾參加過反動組織者的補充通知〉，上海市檔案館，C21-1-160-123。
- ⑬⑭⑮⑯⑰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關於私營工廠民主改革補課第一批廠中團的工作的主要情況與基本經驗的綜合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1-160-48。

- ①④ 〈私營申新紡織第五廠關於民主改革補課工作計劃(草案)〉，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41。
- ②②②③③③③③ 〈青年團私營申新紡織第五廠總支部關於民主改革補課工作的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85。
- ③ 大隆護廠史編寫小組：〈大隆機器廠反拆遷鬥爭〉，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專輯)》，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53-57。
- ④④④④④④④④ 〈青年團上海市普陀區大隆機器廠支部委員會關於民主改革運動的工作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26。
- ⑤ 大隆機器廠：〈大隆機器廠的社會主義改造〉，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3)，頁1269。
- ⑥③④④④④④④ 〈中共申新紡織第九廠機動支部關於民主改革運動幾個問題的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96。
- ⑦ 〈青年團申新紡織第九廠機動支部關於民改工作的總結提綱〉，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108。
- ⑧ 〈青年團申新紡織第九廠機動分部關於民主改革第三階段的自我批評〉，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103。
- ⑨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關於第一批廠重點民主改革補課工作總結提綱的通知〉，上海市檔案館，C21-1-160-115。
- ⑩ 孫成武：〈訴苦運動——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重要的建軍經驗〉，《黑龍江史志》，1994年第4期，頁18-20；姜曉麗、唐明勇：〈情感認同：中共處理危機事件的法寶——以抗美援朝期間的訴苦運動為例〉，《天中學刊》，2011年第3期，頁38-41；孫立平、郭于華：〈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郭于華：《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43-78；李里峰：〈土改中的訴苦：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頁97-109；彭正德：〈土改中的訴苦：農民政治認同形成的一種心理機制——以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6期，頁112-20；王琳：〈苦難的變遷——紅色經典文學中的訴苦運動〉，《文史哲》，2007年第4期，頁111-19。
- ⑪ 〈青年團私營申新紡織第五廠總支部關於民主改革補課工作的總結〉；〈青年團上海市普陀區大隆機器廠支部委員會關於民主改革運動的工作總結〉。
- ⑫⑫ 〈青年團上海市委青工部1952年工廠、商店民改工作情況調查表〉，上海市檔案館，C21-2-314。
- ⑬ 〈青年團上海市普陀區大隆機器廠支部委員會關於團在民主改革補課第二階段工作的計劃〉，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20。
- ⑭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李冠南、何翔譯：〈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載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97-121。
- ⑮⑮⑮⑮⑮⑮⑮⑮ 〈私營申新紡織第五廠關於民主改革補課工作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71。
- ⑯⑯⑯⑯⑯⑯⑯⑯ 〈青年團上海市普陀區大隆機器廠支部委員會團員、青工語匯〉，上海市檔案館，C21-1-187-39。
- ⑰ 〈中共上海市委會關於「五反」運動後在私營工廠進行民主改革補課的指示〉，載《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頁610-11。
- ⑱ 鄒榮庚：〈建國初期上海的企業民主改革運動〉，頁226；張金平、張長森：〈私營企業的民主改革〉，頁297。
- ⑲ 〈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關於青年團第一廠總支在廢除拿摩溫制度產生生產小組長工作中情況的函〉，上海市檔案館，C21-1-160-112。